

在新冠疫情期间，墨西哥格雷罗州
在家接受教育的一名男孩。

新冠疫情时期的 不平等问题

在评估新冠疫情所造成的不平等影响时，并非所有衡量指标都是等价的

弗朗西斯科·H.G.费雷拉

通过以下数字，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新冠疫情所造成的严重影响：死亡人数超过了310万，且仍在增加；1.2亿人陷入了极端贫困状态；全球陷入大范围衰退。在人们的苦难和贫困不断加深的同时，另外一组数据显示，全球亿万富豪的财富在激增。

疫情期间，极端贫困问题不断加深，亿万富豪的财富却在增加，疫情对不平等问题的影响已经不言而喻。而现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众所周知，不平等是一个棘手的概念，人们

很难对此作出明确表述。何为不平等？是家庭收入不平等还是人均GDP的不平等？或是不同群体的死亡率本身不平等？谁的不平等——是个人、家庭还是国家间的不平等？即使我们对分配方案作出精确规定，也无法确切地知晓怎样在群体之间进行分配。有关不平等问题演化趋势的确切结论通常取决于你最关心的是哪个分配环节。不平等问题的各种衡量指标，如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社会中最富有人群的收入份额等，对分布的不同部分敏感性不同。原则上，我们可以对新冠疫情

前后的不平等问题进行不同的排序。在评估新冠疫情所造成的不平等影响时，我们要明确到底需要衡量哪些不平等问题，这一点至关重要。

首先来看一看新冠疫情死亡率本身的全球分布情况。我们使用“因新冠疫情而折损的寿命”这一概念，即根据死亡年龄以及死亡时的剩余预期寿命估算的数据。我们发现，尽管发达国家的卫生和公共预防体系更加完善，但新冠疫情所导致的死亡率负担与人均国民收入仍呈正向相关关系（费雷拉等，2021年）。图1表使用对数尺度在两条坐标轴上绘制了145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每10万名居民因新冠疫情而损失的寿命年数。

尽管死亡率负担在各个收入水平上均存在着巨大差异，例如，巴西的死亡率负担是泰国的1000倍（按人口调整），但死亡率负担与收入水平仍然存在极其明显的正相关性。富裕国家比贫穷国遭受到的人均寿命折损更严重。像布隆迪和坦桑尼亚等一些贫穷的国家明显减少真实死亡人数数据。因此，死亡率数据可能会存在极大的测量误差，但死亡率负担与收入水平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因此，它不太可能是一种伪相关。除此之外，这个结果也反映了富裕国家的老年人的人口结构，同时也反映出这种疾病的死亡率与年龄具有高度相关性。预期寿命增长、更完善城市化和病毒沿着主要贸易路线传播等因素，也对病毒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审视收入不平等问题

我们暂且抛开死亡率不平等不谈，先来看一看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疫情期间，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是如何演变的呢？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首先是，新冠疫情期间，各国人均GDP的分配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布兰科·米兰诺维克（Branko Milanovic）将其称之为“第一种概念的”全球不平等。诺贝尔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平均而言，2020年，富裕国家的经济萎缩情况比穷国更严重（迪顿，2021年）。虽然这个结果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有所缓解，但却证明在2020年，无论是从基尼系数、泰尔指数

还是变异系数等来衡量，实际收入的下降模式确实导致了国与国之间未加权的不平等问题有所缓和。这一现象正是自21世纪之交以来一种趋势的延续，当时，“第一种概念的”全球不平等开始缓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但迪顿认为，如果说这次的缓和有何不同，那就是疫情加速了这种缓和趋势。

这种计算方法是以国家作为计量单位的，因此，卢森堡的权重与中国一样。有人也许会问，在新冠疫情期间，如果按人口加权来计算，各国人均GDP的分配情况会发生何种变化？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将GDP总量在全世界的所有个体间进行分配，然后测量这种情况下分配不平等的现象，这就是米兰诺维克的“第二种概念的”全球不平等。在这种统计方法中，我们会为所有个体赋予其对应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按人口加权的统计方法与此方法一样。

众所周知，不平等是一个棘手的概念，人们很难对此作出明确表述。

当按照人口来加权人均GDP之间的差异时，可以看到2020年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加剧了，迪顿认为，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新冠疫情所导致。更具体地说，可能是印度经济急剧萎缩——在2021年新冠病毒发动第二波更猛烈的攻势之前，印度的死亡率就居高不下，经济也遭受到了重大损失。中国经济的正增长（死亡人数很少）可以抵消印度经济下滑的影响，但目前中国的人均GDP过于接近全球平均收入水平，因此无法完全弥补印度的经济损失。如果在计算时剔除印度，第二种概念的不平等问题将继续缓和，这与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情况一样。通过印度，疫情确实帮助反转了先前国与国之间加权不平等程度不断缓和的形势。

当然，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里，老百姓的收入都不可能完全一样。“第三种概念的”全球

不平等是指，当获得其各自的个人所得时，全世界所有个体之间存在的平等。这一概念可以说是米兰诺维克的三个全球不平等概念中最有趣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考虑到了国家内部存在的平等的概念。相对于许多能“较好”衡量不平等问题指标而言，第三种概念的不平等只是国家内的不平等（其经过适当加权）与第二个概念的、国家间不平等的总和。

既然第二种概念的不平等在2020年有所加剧，那么，如果各国内部的“平均”不平等程度也有所加剧，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新冠疫情期间，个体之间的全球不平等也在扩大，这与大多数人猜想的结果一致。但倘若我们现在就妄下论断，还为时过早。因为，个体收入数据来源于住户调查和官方数据，而2020年的住户和官方数据，我们现在还无法获取。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至少需要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获得有关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情况的数据。

就目前而言，贫困加剧和亿万富豪收入的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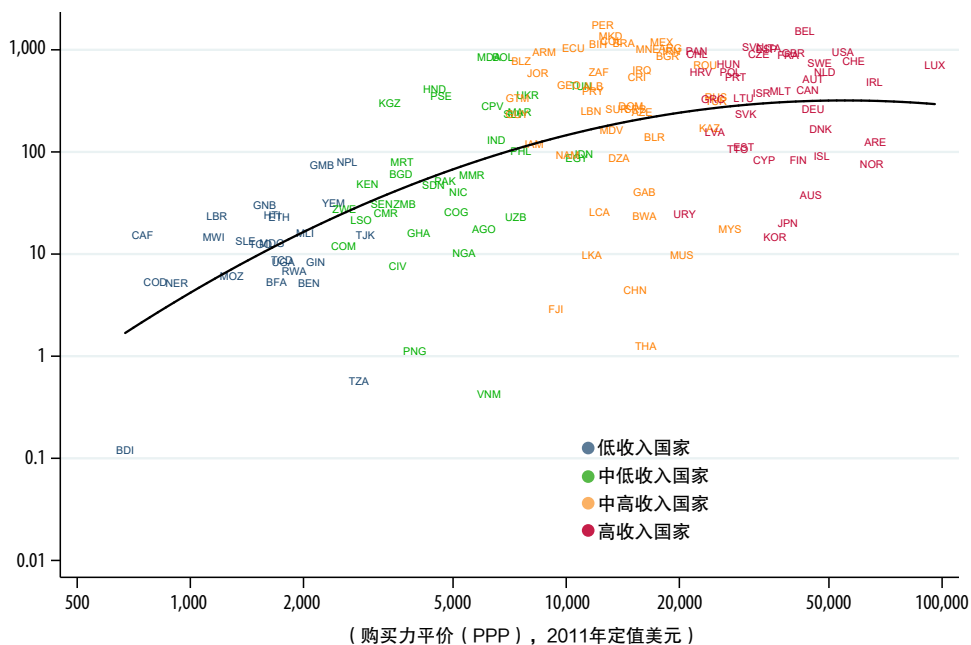
长表明，多数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确实正在加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新冠疫情既引发了新的不平等，又扩大了各国内部原有的收入差距。来源于多个国家的长期证据表明，相比经济萎缩前或萎缩后，在经济严重萎缩时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工人的薪资收入都会减少，而且这种差异会持续多年。新冠疫情引发了大规模的全球经济衰退，势必会在年轻人群体中造成新的不平等。

原有状况

新冠疫情还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中本已存在的不平等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远程办公能力与教育程度高度相关，因此，也与疫情前的薪资水平密切相关。尽管所有人都在谈论“重要人员”、我们每个人“都同处于这场灾难中”，但严峻的现实是，就业岗位和收入损失对技能水平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的打击最大。先来自美国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大数据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尽管这

财富与健康

尽管富裕国家存在一定的优势，但它因新冠疫情损失的寿命年数比许多贫穷国家更多
(每10万人的寿命年数)



资料来源: Ferreira and others (2021).

注: 国家缩写为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国家代码。PPP=购买力平价

些数据中存在一些细微差别（我们在这里不作赘述）。在发展中经济体，劳动力市场的工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具体情况有些细微差别，这里的不平等问题主要来源于非正式工作岗位：低技能劳动者主要从事的是非正式工作岗位，他们无法享受休假或失业保险等社会福利。2021年，数以亿计的临时工每天都要面临艰难的抉择：是为安全起见居家不外出，还是为了维持家人生计去冒被感染的风险。

职场上原本就存在种族和性别歧视，而以上这些劳动力市场上不平等问题加剧，有可能会在许多国家演变为更加严重的种族和性别歧视。此外，由于女性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来照顾孩子和做家务，因此，收入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在新冠疫情期间，资本市场也使不平等问题雪上加霜。尤其是在发达国家，这种现象会更加普遍。为应对2020年3月到4月的大范围经济崩溃，全球主要央行都进一步放宽了货币政策，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目前，这些流动性并未导致商品价格通胀，但肯定已促成了资产价格的居高不下。这也是股市繁荣的主要原因，而支撑股市繁荣的经济基本面却处于低迷状态。央行进行货币政策干预的初衷是美好的，其目的是为了避免企业破产，保障就业。但这些货币政策干预却让主要由富人持有的资产价格飞涨，可以说，干预政策与亿万富豪的总体收入增长存在很大关联。所以在疫情期间，持有亚马逊或Zoom的股票并不是获取财富的唯一途径。

社会转移支付

出于以上多种原因，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预计会进一步加剧，但我们无法确定这种不平等加剧有多普遍。一方面，一些意想不到的证据表明，针对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劳动者的收入转移支付等社会保障政策应对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备受推崇的巴西智库IPEA的早期工作报告表明，2020年5月至9月，巴西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紧急援助”转移支付政策，该项政策在紧急卫生事件应对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仍然帮助巴西缓和了国内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法国、德

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典5个欧洲国家也实施了类似的政策（克拉克、德安布罗西奥和勒潘特尔，2020年）。

在获得可靠的行政和住户调查数据之前，我们无法确切知晓本次新冠疫情对各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与此同时，收入转移支付政策至少能够在短期内作为一项有效的应对措施，而这一暂时性的利好消息，应当会刺激其他国家采取行动。不过，政府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或许，新冠疫情在不平等方面带来的最大隐患是过去一年，可以继续入学或者接受在线教育的孩子与因网络连接不畅或者学校设施差而无法上课的孩子之间的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后者的学习进度很有可能大幅落后于前者，甚至于完全辍学。这些差异所引起的学习和教育机会不平等既普遍又突出，当这些孩子进入劳动力市场时，这种不平等所造成的后果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当中一直困扰着我们。

我们从这些因素中概括的总体情况是，平均而言，如果不按人口进行加权，目前，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而据我们初步推测，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在逐步扩大。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鉴于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会发生动态变化，后者的差距很可能会持续一代人以上的时间。更重要的是，现在看来，如果疫苗接种速度存在差异，美国、英国以及部分亚洲发达国家会比印度、拉丁美洲、多数非洲地区的经济恢复速度更快，2021年，国家之间未加权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很可能还会扩大。FD

弗朗西斯科·H.G. 费雷拉，伦敦政经学院“阿马蒂亚·森”不平等研究教授和国际不平等研究所主任。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Clark, Andrew, Conchita D'Ambrosio, and Anthony Lepinteur. 2020. "The Fall in Income Inequality during COVID-19 in Five European Countries." ECINEQ Working Paper 2020-565,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c Inequality, Palma de Mallorca, Spain.

Deaton, Angus. 2021. "COVID-19 and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2839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Ferreira, Francisco, Olivier Sterck, Daniel Mahler, and Benoit Decerf. 2021. "Death and Destitution: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Welfare Losses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 LSE Public Policy Review 1(4), 2.